

## 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时代特征

杨 心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催生了跨境教育空间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下,跨境教育空间生产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三重结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精神空间生产异质化与社会空间生产趋同化;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资本化,并通过空间修复手段实现教育空间的再生产;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试图对全球教育空间进行重构。学生流动时代和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只有重构全球跨境教育空间秩序,才能使跨境教育空间的生产回归公共性与公益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非正义性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空间生产;跨境教育;全球化;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

**中图分类号:**G5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62(2023)04-0105-8

**引用格式:**杨心.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时代特征[J].现代教育论丛,2023(4):105-112.

全球化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交织和融合(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信息、产品、服务等流动与配置),以及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交流(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的沟通和相互影响)。<sup>[1]</sup>随着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兴起,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压缩,具体表现为从资本到商品、从制度到意识形态、从文化到价值观的流动速度加快。全球化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或是把西方或美国价值视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并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学生、教师、课程诸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使各个国家、区域相对独立的教育空间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所生成

**收稿日期:**2022-11-01

**作者简介:**杨心,女,广东阳春人,阳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电子邮箱:sheepheart@126.com。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全球胜任力为导向的本土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研究”(20YJC880135)

的异质教育空间既排斥“被全球化”，又不可避免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同质与异质空间的融合使一个新的教育空间秩序得以产生。全球化背景下空间重组与规划和资本权力的结构关系日益凸显，资本逻辑正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实现对人们空间实践的操纵，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资本的空间配置，造成现实生活中空间非正义事态持续泛滥并走向全球化。<sup>[2]</sup> 跨境教育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产物，同样面临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问题。揭示跨境教育的时代特征，可以为新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正义性的陷阱寻找出路。

## 一、空间生产与跨境教育空间

### （一）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Lefbvre）是最早把空间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他把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精神空间（mental space）和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三个维度。<sup>[3]14</sup> 物理空间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即通过意识、符号等方式表达出来的想象空间，社会空间是把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融合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有意义的空间”。他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sup>[4]</sup>，进而提出了“空间的生产”理论。该理论指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社会生产已经不再是“空间中物的生产”，而是转变到“空间自身的生产”，即“空间的生产”。<sup>[3]37</sup> 这就意味着，以“商品”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开始转向以“空间”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即空间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为此，列斐伏尔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将空间结构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要素。<sup>[5]</sup> 其中，空间的实践指人们对空间的利用、控制和创造，体现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空间的再现是使空间实践得以理解和言说的符号、代码、术语和知识的过程；再现的空间是为了达到某种象征性目的而通过符号、意向来使用的空间。<sup>[3]33</sup> 再现的空间打破了空间实践和表征的空间二元对立格局，并将前两者带进实际生活的空间。<sup>[6]</sup> 这三个空间生产过程构成了列斐伏尔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及其三元辩证方法，分别对应物理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精神空间的生产三个过程。空间生产理论的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 （二）跨境教育空间

教育空间指教育组织和教育组织所占据的空间，它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社会空间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的影响。<sup>[7]</sup> 教育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具有列斐伏尔的空间三重结构：一是物理空间，即作为客观物质存在的教育空间；二是社会空间，即作为制度存在的教育空间；三是精神空间，即作为主体意义存在的教育空间。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对教育空间的研究即是对教育社会关系的研究，因此空间生产理论适用于对教育空间生产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教育空间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张，跨境教育便是教育空间全球化的典型表现。跨境教育指人、专业、教育提供者、课程、项目、研究和服务的跨国家或地区的流动，是国际化的一部分，也是发展合作项目、学术交流项目和商业项目运作的一部分。<sup>[8]</sup> 根据奈特（Knight）的研究，跨境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表现形式（见表1）。跨境教育的三个时代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划分，并且在历时性上具有重叠性，其区别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其中一种

类型的跨境教育为主要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三个时代的跨境教育仅以主要特征而非严格按照历史阶段进行的划分。

表 1 跨境教育的时代特征与表现形式<sup>[9]</sup>

跨境教育的发展阶段	时代特征	表现形式
第一代 学生流动	学生因教育目的流动到国外	学位或短期学习，研究，专业实习，考察，交换项目
第二代 项目流动	项目流动或教育机构 / 公司跨越边界管辖范围传播教育	项目流动：双联课程、特许经营、可认证的联合 / 双学位、在线 / 远程教育 教育机构 / 公司流动：国际分校
第三代 教育枢纽	国家为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及创新等目的吸引留学生、研究者、劳动者、项目、教育提供者、创新科技公司	学生枢纽：以吸引学生为目的 人才枢纽：以吸引并留住人才为目的 知识 / 创新枢纽：以知识生产与创新为目的

跨境教育空间是教育空间在国际、国家、民族、个体等各个层面中所呈现的社会关系。空间生产理论的三重空间结构辩证分析方法有助于厘清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复杂关系，因此有必要应用此理论分析三个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过程的特征，揭示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规律及其带来的危机。根据空间生产理论，跨境教育空间同样具有三重结构：一是以校园硬件设施存在的物理空间；二是以跨境教育法律法规、学校制度、教学与课程模式等形式存在的社会空间；三是以国家、区域、个人为主体意义存在的精神空间。跨境教育空间生产三个时代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三重空间结构变化的过程。

## 二、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时代特征

跨境教育发展经历不同的时代，其空间生产的三重结构呈现不同的特征。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以精神空间生产为主要特征；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以社会空间生产为主要特征；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则重构了教育空间的三重属性，把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生产进行了整合。

### （一）学生流动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异质化与趋同化

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指以学生到国外进行短期学习或者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完整学习为主要特征的跨境教育。由于学生个体精神空间深受留学目的国影响，并通过个体经验把留学目的国的教育理念、内容、制度等传递到生源国，因此涉及跨境教育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生产问题。

在精神空间生产方面，学生流动到与生源国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均有差异的留学目的国，使他们在精神体验上发生变化。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获得新的知识和能力；提高外语水平；获取新的教学方法及图书、软件、科学设备和实验机构等资源；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与专业网络；

了解不同国家的机构及职能；促进个人发展并建立自信。<sup>[10]</sup>然而，这些“新”与传统的“旧”知识对原有的精神空间产生冲击。以中国为例，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强制性地打开了国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中国。当西方知识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学生个体的精神空间生产发生了异质性变化。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留学归国人才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体现了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精神空间异质化。蔡元培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出国留学期间吸纳了西方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他制定的“五育并举”方针正是坚守和弘扬传统文化、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结果。<sup>[11]</sup>当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时，便发生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加速了整个中国在精神世界的异质化重构过程。由此掀起的“教育救国”思潮，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儒家传统思想、近代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近代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及知识阶层对国内军事、政治、实业各种救国方案的深刻反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sup>[12]</sup>因此，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通过“空间的再现”在个体精神空间上产生异质化。

在社会空间生产方面，由于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对留学生的精神空间影响至深，当他们回流到生源国时，对生源国的教育制度与文化进行改革，从而推动跨境教育社会空间的趋同化。阿特巴赫（Altbach）的“中心—边缘”理论指出，教育的“中心”与“边缘”一直存在，并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心”都主要集中在较早的工业化国家<sup>[13]</sup>，从而形成当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知识体系。从12世纪现代大学产生起，欧洲各国学生就开始到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和萨勒诺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高校学习。13至14世纪的巴黎大学就有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sup>[14]</sup>据统计，2001年全球高校留学生有210万余名，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国排在前五位的是：美国（28%），英国（11%），德国（9%），法国（7%），澳大利亚（4%）。<sup>[15]</sup>其中，美国和英国连续20年保持在全球留学生留学目的国的前两名。学生从世界各地流向世界经济中心，社会层面的规范化运动与个体层面的能力提升并行不悖，正在全面改造着教育空间的格局与动向。<sup>[7]</sup>如1894—1914年，中国高等教育以日为师，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学校系统等方面几乎全部模仿日本模式；1915—1949年，中国开始与美、德、法等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1949—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全面照搬苏联模式；1979—2001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引进、借鉴和学习美、日、德、英、法及其他国家在现代大学课程与教学、治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经验。这些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的教育教学模式都是由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学有所成后把留学目的国的知识与理念带回中国，并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使用西方课程体系代替中国传统课程。目前世界上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或地区（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等）均以英语作为主要教育语言，以英美国家的教育教学体系为主，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渗透本地文化的特征。这些现象体现了跨境教育的社会空间通过学生流动在异国进行着再生产，使世界教育与知识体系的社会空间生产西方化。因此，学生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通过“再现的空间”产生了社会空间的趋同化。

## （二）项目流动时代社会空间生产资本化与空间修复

项目流动是指以课程及项目形式或以教育机构实体的形式到他国为其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跨境教育形式。学生流动的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学生获得多元高等教育的需求，即便在流动最频繁的欧洲国家也仅有不到10%的学生能够到国外留学。同时，由于物理空间的有限性，留学目的国的高校不能承受大规模留学生的求学需求。为进一步扩大跨境教育在后发国家的影响力，20世纪初以项目流动为特征的跨境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其主体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或组织，主要形式有国际合作办学及设立海外分校。



跨境教育项目的全球流动涉及多国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体系及制度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标准体系以确保项目流动的顺畅性，由此诞生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在该协定推动下，由西方教育管理制度、课程与教学体系、质量评估标准等制度或标准组成的跨境教育社会空间开始资本化，并被出售到他国，使跨境教育项目提供商成为最大的经济受益者。以澳大利亚为例，教育服务成为仅次于煤矿和铁矿石出口的第三大支柱出口行业，2009年教育出口额达到186亿澳元，为澳大利亚提供了12.5万份工作。<sup>[16]</sup>服务贸易总协定把跨境教育服务看作是商业性质的贸易服务，改变了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共性特征，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消费本国高等教育的剩余价值向后发国家转移并扩张跨境教育空间。

资本主义充满危机却依然具有活力，其关键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在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关系从难以延续的空间迁移到新的空间并得以再生产。<sup>[17]</sup>这一过程被称作“空间修复”，即通过开发新市场来创造生产能力和能源、社会与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空间转移。<sup>[18]</sup>以项目输出为特征的跨境教育时代便是资本主义以服务当地学生为由，试图在输入国复刻输出国的教育项目以迁移教育空间，并获得高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从而达到空间修复的目的。据统计，截至2020年11月全球共有305所大学设有海外分校<sup>[19]</sup>，其中作为输出国排名前列的分别是美国（28.1%）、英国（14%）、法国（12.4%）、俄罗斯（9.5%），作为输入国排名前列的分别是中国（13.7%）、阿联酋（10%）、新加坡（5.2%）、马来西亚（4.5%）。从跨境教育项目的流动方向看，大部分项目是从先发国家流向亚洲、中美洲和欧洲中东部等后发国家。可见，在跨境教育的项目流动时代，先发国家借助学生流动时代建立起来的教育社会空间趋同化及西方中心的世界知识体系的便利，通过“再现的空间”方式向后发国家扩张并转移其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教育空间，实现了跨境教育的空间修复。

### （三）教育枢纽时代跨境教育对全球教育空间的重构

教育枢纽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由后发国家发展起来的，指“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通过一致而有计划的努力聚集大批国内外行动者，战略性地参与教育、培训、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从而建成公认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sup>[9]</sup>发展教育枢纽的目的在于为学生增加入学机会、为社会增加经济收益、培养高素质劳动力、构建基于知识与创新的经济体系，以增强国家在区域间的地位与竞争力。例如，新加坡政府于2002年推出“环球校园计划”，旨在吸引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知名大学在本国设立分校，目标是到2015年吸收15万名国际留学生，并将教育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从1.9%提升到5%。<sup>[20]</sup>该计划引进海外分校在本国建立实体学校是实现跨境教育物理空间本地化生产的过程，吸引留学生是实现精神空间本地化生产的过程，这些过程带动的经济增长是跨境教育社会空间本地化生产的过程。新加坡通过“环球校园计划”已成为公认的亚洲教育中心之一，改变了只有先发国家才是教育中心的格局。因此，如果说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后发国家被动接受先发国家的教育投资，那么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则是后发国家主动发起的试图改变全球教育空间生产的战略性反击。因为通过教育枢纽建设，后发国家开始由人才流失向人才虹吸的状态转变，高等教育从内部结构调整向外部职能延伸转变，构建了以后发国家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与创新机制，从而摆脱了一味模仿先发国家教育模式的困境，尝试走一条自主进行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道路。

当主观和客观、精神与物质的要素通过社会行动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其中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就可以称为“空间重构”。<sup>[21]</sup>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正是由社会空间变化而引起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变化的重构过程。例如，中国实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是对项目流

动时代跨境教育的复刻性进行创新的有益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这是与项目流动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资本化的抗争。又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当接受中国政府对教育机构的管理,按要求设置中西方知识与文化融合的课程体系,在使用项目来源高校的课程体系时能够把握中国教育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话语权,建立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这是对跨境教育社会空间趋同化的积极回应。教育枢纽时代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使全球区域性的留学中心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日本、韩国成为东亚地区留学网络的中心,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地区留学网络的中心,埃及和南非成为非洲留学网络的区域中心,巴西和墨西哥成为中美洲和南美洲留学网络的中心。<sup>[22]</sup>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不再只是学生的输出国以及跨境教育项目的输入国,而是通过在地国际化实现跨境教育的物理空间生产,通过创新教育教学制度与标准等方式的社会空间本地再生产减缓资本主义向后发国家扩张教育空间的步伐,并通过境外办学等方式推动精神空间在他国的再生产。因此,后发国家试图通过教育枢纽建设使跨境教育空间进行本地化的“空间的实践”及“再现的空间”,并通过“空间的再现”重塑国家、民族与学生个体的精神空间,最终实现对全球教育空间的重构。

### 三、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表现及正义性的回归

空间非正义现实源于资本逻辑对主体空间实践的支配。<sup>[21]</sup>在全球化背景下,尽管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在优化配置、优势互补等方面促进了世界知识与文化的共同进步,但同时先发国家也通过对教育的资本化将资本主义的矛盾转移到全球,为后发国家带来诸如人才流失、文化殖民化等负面影响,随之出现的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等均是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非正义性问题的控诉。

#### (一) 学生与项目流动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

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世界拓展。<sup>[23]</sup>学生与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空间掠夺的方式把空间非正义性向全球范围延伸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生流动时代跨境教育的社会空间趋同化造成全球教育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空间规模内部存在的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的混乱交织催生了地理不均衡发展并成为其存在的势能动力。<sup>[24]</sup>先发国家跨境教育空间的全球扩张使西方中心主义愈演愈烈,他们控制了全球知识与资本的话语权,导致人才、知识与资本过度集中于先发国家,使其与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人才吸引力、知识创新等方面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两极分化的特征。

第二,项目流动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的资本化与空间迁移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一方面,跨境教育空间的资本化引发与教育公平相关的社会矛盾。例如,资本逐利促使跨境教育服务提供商哄抬教育资源价格,使富家子弟获得更多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被剥夺了教育空间的国家公民不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引起诸如针对留学生的反社会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跨境教育空间迁移加剧了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依附。例如,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项目使教学模式在后发国家进行简单复制的同时,也把先发国家的教育问题带到了后发国家,其问题解决的途径又回到先发国家的经验反馈上,使后发国家产生了对先发国家的依赖。总之,学生流动与项目流动时代的跨境教育均围绕西方的知识体系进行着空间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充斥着诸多教育空间非正义性问题。

## （二）教育枢纽时代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正义性的回归

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意味着后发国家试图破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获得剩余价值的陷阱，把被动的空间剥夺转变为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主动的空间重构。教育枢纽时代的跨境教育通过国际名校的本地化改造打破了物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现状，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地化融合打破了社会空间的趋同化，通过学习方式的创新与改革缓解了精神空间异质化带来的风险，为消除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打下基础。

空间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空间的使用权问题或者说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权问题，表现为对空间的支配权和分配权。<sup>[24]</sup>因此，跨境教育空间生产正义性的回归应夺回西方对教育空间生产的话语权，重新分配跨境教育空间的支配权。第一，摒弃跨境教育的资本化，以本国公民利益为中心，回归跨境教育空间生产的公共性与公益性。“教育空间本应是旨在促使人类自由解放的空间，它理应摆脱资本支配，为人民所有、所用的公共空间。其实也只有成为公共空间，为全体人民所有和所用，才能摆脱资本支配。”<sup>[4]</sup>因此，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下，跨境教育空间生产应实现物理空间生产的共享性，使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平等而普遍的使用；实现社会空间生产的融合性，坚持传承本国优秀传统知识与文化，有选择性地吸纳世界优质资源，形成本国特色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实现精神空间生产的自主性，坚持国家、民族与个体的文化自信，以批判精神来生产与创造世界知识体系。

第二，通过教育枢纽寻找跨境教育空间的平衡点，重构全球高等教育秩序。在跨境教育空间自身结构中，社会空间是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平衡点，而社会空间生产的平衡点需要在国际与国家间寻找一条融合本国与世界教育理念、目标、内容与制度等方面的道路。这就要求后发国家通过建设教育枢纽摆脱对具有西方特色的教育社会空间的依附，对跨境教育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进行再生产，通过教育空间三重结构的重组、融合与创新以重新构建全球教育空间的平衡秩序。

### 参考文献：

- [1] 李琼. 世界经济大辞典[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632.
- [2] 张青兰,李育林. 空间正义的主体性阐释——基于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J]. 广东社会科学, 2022,218(6): 65-74.
- [3] LEFBVRE H. Production of Space[M]. Donald Nicholson-Smith,D.Tra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 [4] 列斐伏尔. 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A]//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5] 何雪松.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 社会,2006(2):24-48,206.
- [6] 付强,辛晓玲. 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育空间生产[J]. 山东社会科学,2019(4):74-79.
- [7] 苏尚锋. 教育空间的增殖与中心位移[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6(4):151-161.
- [8] [法] 兰格林. 跨境高等教育：能力建设之路[M]. 江彦桥,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8-9.
- [9] KNIGHT J.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1(3):221-240.
- [10] 皮特·斯科特.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M]. 周倩、高耀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7.
- [11] 张勤,张晓庆. 蔡元培国民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江苏高教,2016(1):152-155.
- [12] 吴春苗. 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J]. 高教探索,2019(4):107-116.
- [13] ALTBACH P G. Peripheries and Centres: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2019(2): 106-130.
- [14] 陈学飞.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33.
- [1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 Atlas 2018[EB/OL]. (2019-09-20)[2022-10-30]. <https://www.iie.org/research-initiatives/project-atlas/explore-global-data/>.

- [16] 张进清. 跨境高等教育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 [17] 王志刚. 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125.
- [18] [美]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 [M]. 初立忠、沈小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90.
- [19] C-BERT. International Campuses[EB/OL]. (2020-11-20) [2022-10-30]. <http://cbert.org/resources-data/intl-campus/>.
- [20] 宋佳. 亚洲高等教育枢纽之争: 路径、政策和挑战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5, 42 (12): 79-91.
- [21] 叶涯剑. 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6 (1): 68-70.
- [22] 马佳妮.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留学生教育的特征、挑战与趋势 [J]. 教育研究, 2020, 41 (10): 134-149.
- [23] 刘洋, 胡跃莽. 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创新实践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9 (1): 64-72.
- [24] 刘鹏飞. 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中的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满仓)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P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YANG Xin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631)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has given birth to the p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spa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Lefebvre's theory of space produc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space production includes three structures: physical space, ment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Space p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heterogeneity of mental space produc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of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student mobility; the capitalization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project mobility, and reali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space through space restora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education hub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global education space.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student and project mobility reflected the injustice of space produ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only by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order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space can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turn to publicity and public welfare, and can the unjust crisis of capitalist space production be prevented.

**Key words:** Space produc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Physical space; Mental space; Social space